

劳动者之歌

百炼成钢

——记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金牌首席员工杨金安

本报记者 夏亮清 通讯员 王佳宁

人物小传

杨金安是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金牌首席员工、冶炼车间50T电炉班班长。炼钢32年来，他勤奋好学，勇于创新，共进行重大攻关课题研究8项，提出创新合理化建议20余项。工作中，他不但屡创佳绩，屡破纪录，还依托工作室，不断培养年轻人才，为企业注入活力。



炼钢中的杨金安。

(资料图片)

“多向经验丰富的师傅请教。”杨金安说，关键是要积累经验，学习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思路。

杨金安有一本微微泛黄的64开工作手册，总是寸步不离地带在身上。每天的工作安排、炼钢种类、材料、大小，以及每炉钢水的电耗、氧耗等，他都记录在册。32年来，这样的笔记本，杨金安用了50多本，成为他的炼钢“宝典”和创新“大数据库”。

“我就是喜欢摸索怎么炼钢！”现在取一勺钢水，泼在地上，杨金安就能判断出它的碳含量；看炉渣的温度，就能判断钢水的温度。这不仅是年复一年的经验积累，更有可贵的创新精神融贯其中。

目前，杨金安共进行重大攻关课题研究8项，成功完成推广应用5项，提出创新合理化建议20余项。

三天两破纪录

在杨金安大工匠工作室里有一个1米高的玻璃柜，里面陈列着一块块钢种样品，有超低碳不锈钢系列、核电钢系列、航空航天钢系列等，记录着杨金安和团队在炼钢领域攀登的一座座高峰。

2015年6月10日，刚刚下夜班的杨金安累得睁不开眼，但他坚持没有回家。上午9点，由他主持的目前国内最大规格、超大型整锻加氢筒体锻件用338吨钢锭浇注的工艺策划会准时召开。

会议持续到上午11点。等送走了所有人，杨金安把自己关在工作室，反复翻看早已了然于胸的每一个工艺策划细节。

接着又赶到生产现场，仔细查看开工前各道工序的准备情况。

14时，杨金安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午饭也没有吃，挨着床就睡着了。

19时，杨金安猛地醒来，草草吃了些饭，就早早赶到公司。晚上22时，送电、炼钢，“战役”即将拉开。

然而一个突发的小故障让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杨金安吆喝着关掉电闸，抢着爬上炉子一看，原来是电极夹头的横臂端面磨损，造成电极打火，如果修整夹头端面，需要四五个小时。

但生产计划已经排出，所有设备、所有人都在等，根本来不及修。杨金安与机修主任紧急商量后，决定临时加铜垫片。

23时40分，机修人员经过火速抢修，再次送电。50吨电炉正常启动、开炼，其他设备相继“上阵”……冶炼车间内一时间轰隆隆响声一片，红彤彤火热一片。

杨金安不敢有半点懈怠，紧盯现场，寸步不离。

2015年6月11日17时30分，钢水精炼结束，他又来到浇注现场，“出钢就在两三分时间内，钢水会二次氧化，化学成分也会变化，钢水余量不足会出现‘卷渣’，不能有任何差池！”

19时，338吨超大型加氢筒体锻件用钢锭成功完成浇注。

2015年6月12日夜晚，国内最大管板锻件也成功完成冶炼、浇铸。三天三夜两破纪录，杨金安破例开了一瓶啤酒庆祝，结果面条还没吃完，就歪在椅子上睡着了。

多少个后半夜被电话惊醒，多少次奔

赴炼钢车间，力挽狂澜。杨金安说，只有历经千锤百炼，才能成为优秀的炼钢人！

打造大工匠团队

2013年，杨金安“大工匠”工作室成立，他和另外11名优秀技师、年轻工人组成团队，每周五上午在一起探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晚上炼钢，白天讨论业务，杨金安起初担心影响休息，没想到大家的热情让他有些招架不住，“原本12人的团队，每周来开会的却有三四十人，坐不下了就站着”。

在这个十几平方米的工作室里，一个个重大课题被攻克，一项项创新合理化建议被提出，杨金安却并不满足，“每个人都成为‘钢铁战士’”。

他最担心公司年轻炼钢工人断档。“最难熬的是炼钢的脏、累、苦，年轻人如今很少有能坚持下来的。”杨金安说，炼钢主要靠实践、实战，没有十年八年的炼钢经验，根本就不具备当带班班长的资格。

每遇到一个炼钢好苗子，杨金安都会如获至宝，毫不保留地把所学技艺传授给徒弟。一个新进公司的大学生想到工作室旁听学习，杨金安兴奋不已：“欢迎！欢迎！我们工作室的大门永远敞开！”

2015年，除参与年度重点课题科研攻关外，杨金安大工匠工作室的重要任务就是优化操作方法，做好年轻工人的培训，传授实践经验和诀窍，带动更多的职工提升技能。“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创客’精神，更需要‘工人创客’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辜负公司的期望和重托，不负这个大平台和好时代。”杨金安说。

如他所愿，在人才的强力支撑下，中信重工已拥有国内首台80吨电渣重熔炉和80吨超高功率电弧炉、150吨LP精炼炉等一大批国内最先进的炼钢设备，打造出国内乃至全球冶炼能力最大的炼钢系统，具备冶炼所有钢种的生产能力。



把青春献给北斗

——记交通运输部导航中心副主任王淑芳

本报记者 齐慧 实习生 朱佳

人物小传

王淑芳是交通运输部导航中心副主任，大学毕业后就从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发工作，28岁时担任中国卫星导航增强系统主管设计师，全面参与二代北斗系统论证，32岁担任二代北斗应用系统主任设计师。曾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个人三等功、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建设者等荣誉。



王淑芳在认真工作。

(资料图片)

“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的GPS和俄罗斯的GLONASS两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我国导航系统还处于空白领域。我当时想都没想就投身到北斗的研发中。”23岁的王淑芳放弃了外企的Offer，毅然投身于北斗事业，负责北斗的用户机研制。

当时艰苦的工作条件远远超出王淑芳的预料，“刚工作那阵儿，待遇不高，每个月只有三四百元的工资，4个人住在一间宿舍里。办公地点就在招待所，闷热的夏天里，只有一个摇头扇不停地转”。

但这些都与北斗的吸引力相比不算什么，王淑芳和同事克服了困难，认真工作。1997年夏天一个炎热的夜晚，王淑芳的团队见证了第一台北斗用户机的诞生。

那晚，王淑芳兴奋得彻夜未眠，第一次喝了瓶啤酒，第一次用一整天的时间美美地睡上一大觉。

王淑芳工作上全身心投入，科研能力提高很快，在同龄人中逐渐崭露头角。在中国卫星导航增强系统建设时，王淑芳成了唯一入选项目组的年轻人，28岁时就担任中国卫星导航增强系

统主管设计师。她利用一代北斗系统以及卫星导航增强系统建设的经验和较高的宏观把握能力，全面参与二代北斗的系统论证，32岁时成为最年轻的北斗系统主任设计师。

为推广北斗“任性”转业

2007年，王淑芳决定转业到交通运输行业。“当时家人、朋友、部队的领导都认为这个决定太任性了，十分不理解。”但王淑芳明白，美国的GPS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应用推广做得好，带动了后台产业链的发展。

我国交通行业拥有1000多万辆营运车辆、十几万艘营运船舶，还有高速公路、航道、港口等基础设施，是卫星导航的最大用户。王淑芳既是两代北斗系统建设方案的论证者，也是4项国家军用标准的执笔者，转业交通领域，就是想“建北斗、用北斗，让更多人享受北斗带来的便利”。

2012年，王淑芳牵头实施二代北斗第一个示范工程。刚开始时行业内比较

抵触，GPS用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用北斗？

为了让大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她一年内组织了5次工程协调会。有一次恰逢北京下大雨，航班大面积延误，来自9个省份的30多人，有的半夜到京，有的甚至是凌晨到。王淑芳顾不得第二天还要组织会议，坚持亲自接机。一位参会人员感激地对她说：“你用私家车来接机，我们再不好工作就对不起你们了。”

就这样，上下齐心，共同努力，北斗示范工程超额完成推广任务，带动400多万台北斗终端进入交通领域，实现产值上百亿元。

让更多人享受北斗带来的便利

“大屏幕上显示的就是北斗系统在‘12吨以上重货’‘两客一危’等重点营运车辆方面的应用。右上角这个数字说明，目前，已有327万多辆12吨以上的重型货车和接近70万辆‘两客一危’营运车辆使用了北斗系统的终端。”站在应急指挥大厅两块巨大的显示屏前，王淑芳显得格外娇小。北斗系统一方面为营运车辆司机等提供了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分析，也为营运车辆异地经营、分时段限制行驶等行业监管提供了便利。

王淑芳坦言，刚开始，北斗的推广应用遇到了很多困难。为解决出现的问题，王淑芳她们走到一线去，了解实际情况，并制定相关政策、管理办法等，使北斗系统的应用推广在短时间内取得较大的成果。

“我们会进一步加强终端安装后的后续管理，比如终端上线使用情况、平台服务商服务管理、终端质量抽查等。同时，还要把车联网联控数据与道路客运联网售票、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等数据进行后台融合，加强综合分析。未来，北斗系统也将更多地应用于水上搜救、企业服务等方面，让更多人享受北斗带来的便利。”王淑芳说。

16年来，他背坏了12个药包，骑坏了6辆摩托车，行程40多万公里，在大山中爬冰卧雪、栉风沐雨，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出诊17万余次，保障了周边28个村庄百姓的健康。

他不富裕，却免收出诊费37万余元，还为13户五保户支付药费4.5万余元。

他是山西省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乡村医生贺星龙，在缺医少药的吕梁山腹地坚持行医多年，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最美乡村“摩托医生”。

本报记者

随叫随到的医生

刘存瑞

5月的吕梁山，乍暖还寒。《经济日报》记者驱车从山西临汾市进入大宁县，翻过几座大山，才来到徐家垛乡。向路边老人打听贺星龙，老人家说，“呵，是龙娃子呀，乐堂村的赤脚医生，不管白天黑夜，他随叫随到”。

在乐堂村贺星龙的诊所等候他时，记者与三五村民聊起贺星龙。村民们说，方圆百十里没有不认识贺星龙的。就连附近永和县及黄河对岸的陕西省延长县的村民，有个头疼脑热的，只要一个电话，贺星龙就骑着摩托车赶过去了。

记者拨打贺星龙的电话，听到“您好，贺星龙医生对各村常见病提供24小时上门服务，不收出诊费”的彩铃声音。村民们说，这是贺星龙在2006年设置的，当时，他还印发了4000多份传单和名片。

随着一阵摩托车声响，贺星龙回到诊所，他刚才去徐家垛村给一位老人看病了。眼前的他，戴着一顶盖住了耳朵的帽子，穿着一件褪色的灰色衣服，鼓鼓囊囊的行医包背在肩上，中等个子，脸膛黑红，眼角泛起几道与年龄不相符的皱纹。

正准备吃午饭时，贺星龙的电话又响了，他憨憨一笑说：“有个村民发烧咳嗽，我得赶过去。”记者跟随他来到这位患者家中。贺星龙熟练地为患者听诊、开药、输液，并不时安慰两句，患者的情绪渐渐稳定：“龙龙，这回多亏你了。”

说起贺星龙，村民们都记得那个故事：2013年腊月的一天，下着鹅毛大雪，索堤村贺润平的孙子发高烧。贺星龙接到电话后，背上行医包，骑着摩托车赶去。不料，雪越下越大，坡陡路滑，贺星龙连人带车一起跌进路边1米多深的沟壕里，右脚受伤。他忍着脚痛，扶起摩托车，艰难地赶到患者家中。第二天，他的脚更肿了，就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出诊。

为村民送医送药

在距乐堂村十里路的上村，五保户冯对生孤身一人住在村里闲置的学校里。老人双腿残疾，脚蹠处皮肤溃烂。贺星龙知道后，便天天到老人家里，照料老人吃喝，给老人看病换药，从不收诊疗费，药费也由他来垫付。

“有钱看病，没钱也给看病。这娃从来没有张口要过钱。这不，现在我还拖欠星龙100多元医药费。”索堤村70岁的庞润娥患有高血压，今年年初头晕得厉害，贺星龙给她输了5天液。她家里经济拮据，一时拿不出医药费，只能等卖了核桃再跟贺星龙结算。

在贺星龙家，记者发现了7本厚厚的账本，上面记着他多年来给部分低保、无保老人赠送的药物数量，总计价值45689元；还有近4年患者拖欠医药费的账目，有些因为种种原因已成死账，多达57235元。“以前的账我已经全烧了。”贺星龙告诉记者，“村民生了病，总不能因为没钱就不给看吧”。

“村里有不少五保户、低保户，给他们看病我都不收钱。去年收成不好，不少人看病就先赊着。”贺星龙说得轻描淡写。

其实，贺星龙并不富裕。他每月仅有400元的固定收入补助，以及公共卫生补贴和一针5元的疫苗接种补助，妻子在一家打印店打工，每月工资700元，再加上种地的收入，他家年收入约2万元。

那么，是什么支撑着贺星龙留在村里为村民行医16年呢？贺星龙说，“回村给乡亲们看病是我儿时的愿望”。

贺星龙12岁那年，最疼爱他的爷爷得了肾病，因无钱医治去世。临终前，老人拉着贺星龙的手说：“娃呀，好好念书，长大学医。”从那时起，贺星龙就有了当医生的念头。

1996年，贺星龙考上了太原市卫校，可每年6800元的“巨额”学费让他望而却步。无奈之下，他选择了每年只需3000元学费的运城民办卫校。就这3000元，也是全村人凑齐的。毕业后，大宁县县医院曾想留下贺星龙工作，可他推辞了，执意要返回村里，“是大伙凑钱供我上学，留在城里，良心上就对不起乡亲们”。就这样，贺星龙回到村里，每天早上5点出门，晚上11点多回家，为患者看病。

2009年，贺星龙的两个孩子到县城上学，妻子想让他把诊所开到县城，偷偷租下一间门面房。可贺星龙不同意，他放心不下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他说：“不是村民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村民。”在他心中，山村病人的事，就是他心中顶天的大事。



更多中国故事
系列报道请扫
二维码

本版编辑 同赫 邱冰
邮箱 jrbzqgs@163.com